

D
AXUESHENG RENSHENG
XIUYANG ZHUANTI YANJIU

大学生 人生修养 专题研究

主 编：罗芝磐 梁世雄 韩东才
副主编：黄可波 蔡日安

中山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人生修养专题研究

主 编：罗芝馨 梁世雄 韩东才
副主编：黄可波 蔡日安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生人生修养专题研究/罗芝馨,梁世雄,韩东才主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9

ISBN 7-306-01679-2

I. 大… II. ①罗… ②梁… ③韩… III. 大学生—人生观—专题研究 IV. 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031 号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721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莞庄路 邮编:510612 电话:87705740-269)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94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50 册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序

陈业彬

“修身”、“养性”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尽相同的内容、要求和途径，但它自古以来就是人生理论的重大课题。当今时代，人生修养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江泽民同志说：“求知与修养相结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文化传统……青年时期注意思想修养，陶冶情操，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自己一生的奋斗和成就将会产生长远而巨大的作用。”如何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有效地指导大学生进行人生修养，提高政治思想素质，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十分关注的问题。思想政治素质是人的综合素质中最重要的素质，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对人的成长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的作用。有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才能把学到的知识真正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才能有所作为。广东教育学院马列室主任罗芝馨教授、政法系主任梁世雄副教授和韩东才副院长组织院内一批德育工作者经过长期的探索，总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复杂环境里，指导大学生进行人生修养的成功经验，并在教学实践基础上进行了理论的概括，撰写了本书——《大学生人生修养专题研究》。撰稿的老师们怀着对德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对青年学生的满腔热情，在繁忙的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中细心观察，积极试验，潜心研究，奉献出了自己的心血，这是他们教书育人的成果。本书以思想、政治、品德的修养为重点，各章分别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大学生人生修养

的内容、途径和方法。因此，这是一本人生修养的指导书，对于正在成长的同学们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践性，而对德育工作的同行们也是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的努力，我国学校德育工作的大政方针，以及相关的法律、规章已初步形成体系。国家的法律法定了教育的性质、根本指导思想、发展的方向以及德育的总目标，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规章也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各学段的德育目标、内容、途径、方法以及管理与评定等。应该说，在跨越新世纪之际，我国德育工作已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摆在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落实。要按照学生成长规律，把教育的任务分解到各个年级、各个学科以及各项校内外教育和实践活动中去。学生的“五爱”情感，文明的行为习惯，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遵纪守法意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都有一个通过教育逐步形成的过程，所以，要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形成一定的目标递进层次。德育体系的设计和调整还必须结合本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以及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并逐步形成本地区本院校的特点。符合实际的、有效的德育必然是多姿多彩的，不应该是一个模式，一个面孔。因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努力创造出自己的德育模式和品牌来。

素质，作为人本身相对稳定的品质，是知识内化的结果。要将人文知识提升为人文精神，使知识转化为素质，内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通常所说的“入心”、“入脑”，我看也就是一个内化的问题。一方面要改进德育工作，使德育的内容为受教育者乐于接受，易于吸纳；另一方面要提高学生加强自身修养的自觉性和内化能力；还要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为把知识内化为素质创造条件。所以，德育一定要与学生生活和社会实践紧密联系，离开活生生的学生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从本本到本本，

空对空，只能是无的放矢的空头德育，不仅不能产生正效应，还可能加重学生负担，加剧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要树立德育的效益观，注重教育资源的投入和产出的效益，减少不计成本的无效劳动，提高德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重教必尊师，而为师者需修身垂范。在教育方针、政策已经确定，必要的外部条件具备之后，校长、教师的师德和创造性劳动便是办好教育的决定因素。在我国，教师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者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思想过硬、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精于教书、勤于育人的教师队伍”。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培养、培训重要基地的省级教育学院，德育工作更具特殊的意义。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躬行实践等师德规范都应成为塑造教育学院学生健全人格的重要内容。

相信本书的出版将对大学生人生修养的实践及其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期望更多的优秀科研成果面世。

(陈业彬同志是广东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

目 录

序.....	陈业彬 (1)
--------	---------

第一章 论大学生的两大任务——学会做人与做学问	(1)
第二章 论大学生的人生责任	(16)
第三章 论大学生的素质构建	(33)
第四章 论大学生的理想追求	(46)
第五章 论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63)
第六章 论大学生的拼搏成才	(77)
第七章 论大学生的社会实践.....	(109)
第八章 论大学生的科学审美.....	(122)
第九章 论大学生的人格塑造.....	(136)
第十章 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道德.....	(153)
第十一章 论大学生学习与修养.....	(179)
附录一 苦是甘的代价	(204)
附录二 加强对优秀生的教育是实施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	(213)
附录三 新闻调查.....	(223)

后 记.....	(230)
----------	-------

第一章 论大学生的两大任务 ——学会做人与做学问

在人类以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心情迎来新的千年之际，人类社会席卷全球的信息化知识化浪潮方兴未艾，经济插上知识的双翼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影响，也对肩负振兴中华历史使命的中国新一代大学生提出了崭新的时代要求。一方面，他们必须是现代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和人类文明的传播者，必须要有学问，有知识，只有这样才具备挑起历史重担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是思想进步，作风正派，深受社会与人民欢迎的人，只有这样，他们的学问、知识、能力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有用武之地和发挥应有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学会“做人”与“做学问”。如果我们培养的大学生没有真才实学，或者虽然才华横溢但不诚实，有丰富的知识但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志向，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但没有责任心及与他人合作的精神，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是缺陷的教育，我们的大学生就是蹩脚的大学生。可见，学会“做人”与“做学问”以及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不仅过去是至今仍然是大学生面临的课题。

一、学会“做人”与“做学问” 是当代大学生面临的两大课题

上大学，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在大

学校校园里，有知识渊博的良师指导，有丰富的图书资料，有现代的教学设备并洋溢着浓厚的求知氛围，大学生——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能跨入神圣的高等学府进行深造，且生逢盛世，遇上了几代中国青年梦寐以求的大好历史良机，拥有大多数同龄人羡慕不已的成才环境，可谓是时代的幸运儿。但这一切，仅仅是为他们成长为新世纪中国的脊梁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能否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还有赖于他们的主观努力，取决于他们在校期间对“做人与做学问”的思考和锤炼、认识和实践。

曾几何时，大学生与“铁饭碗”、“跳农门”紧密相关，考上了大学就意味着日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终身无忧。农村的孩子“金榜题名”就意味着自己彻底告别父辈们的耕作生活而一跃成为“城里人”。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由国家统一包揽并决定学生去向的毕业分配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双向选择”。换言之，大学只为学生日后的发展提供一个培养自身综合素质的场所，能否成才，最终还得靠自己努力。近年来，我国高校扩招方兴未艾，民办高校不断增多，高等学府的大门进一步向适龄青年敞开，大学不再像昔日那样高不可攀。据报道，2000年广东省的高考入学率将达65%，5年后将达到100%。届时拥有大学文凭的青年将比比皆是，大学生在择业时的天然优势将不复存在，社会用人将实行“优胜劣汰”的机制，大学生失业将不再是新闻。其次，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正在来临，以网络经济为主导的新经济开始出现，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同国际接轨的距离越来越近，就业领域对外语能力以及计算机的应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就业市场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入WTO后，越来越多的洋人进入中国“谋生”，使人才市场上的竞争更趋白热化。面对如此复杂的外部世界，大学生们如果没能未雨绸缪，刻苦攻读，学好

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一旦跨出校门将难以适应新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早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的研讨会上就提出,要适应21世纪就业的需要必须要掌握两门专业技术,学会两个国家的语言。因此,大学生应该珍惜时机,把握自己,做好学问,才能在社会坐标系中找到能体现自身价值的闪光点。再次,一个学习化的社会正悄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终身学习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定势。据专家估计,现代社会劳动者知识的半衰期已缩至5~7年,以往取得大学学历就可终身享用的状况将成为历史,未来社会真正的文盲将不再是没有知识的人,而是不懂得如何学习、如何更新与丰富知识的人。曾获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崔琦教授谈到来自中国高校的一流学生时说:“他们的考试成绩非常好,但我告诉他们,做学问可不是做作业,那只是重复前人做过的事情。”^①可见,“做学问”将不是围着分数转,而是要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所以,李岚清同志指出:“教育的重点应当是在掌握必要文化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获取新知识的方法和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不断补充新知识,解决新问题,从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是观之,时代的发展对“学问”已赋予新的内涵,如何做学问,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真正做到学有所获,学能所用,值得大学生们深思。

“做学问”无疑是青年学生的天职,但是仅仅学会“做学问”还不行,还要学会“做人”,这也是历代教育对受教育者的要求。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是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成长的,因此,重智育轻德育与心理素质的培养对他们的发展造成缺陷,加上他们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受宠,缺乏刻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磨炼,对生活责任以及人生的思考比较零碎和肤浅,生活经历单一,社会经验不足,心理脆弱且不成熟。一方面,他们风华正茂,活力四

射，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着美好期待；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不良现象，使他们的内心不可避免地交织着青春期的困惑、犹豫甚至彷徨。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理想，但这种不稳定不成熟的心理和思想状态使其对理想的思考与追求欠缺理性的成分。社会的转型，道德建设的滞后，经济人与道德人两种人格的冲突，多元化的价值观与道德观等对大学生的成长带来极大的影响。近年来在大学校园里不讲礼貌、不讲公德、两性关系混乱，甚至盗窃、嫖娼、自杀、杀人等时有发生。因此，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对大学生来说仍是个严峻的考验。

二、学会“做人”与学会“做学问”的辩证思考

学会“做人”与“做学问”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古今中外的名人在不同的时代都对其进行过探讨，并作出过深刻的论述。

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影响中国数千年的《论语》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②意思就是说，青年后生在家应该孝敬父母，出外应该尊敬长辈，办事应谨慎而且言而有信，博爱大众并亲近有仁德的人，做到这些后还有多余的精力的话，再去学习文化知识。另外，孔子还认为如果做人合格，也可被认为是“有学问”了。《论语》中有：“子夏曰：贤以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未学，吾必谓之学矣。”^③其意思就是一个人能尊重仁德而轻视女色，事奉父母，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事侍君主，能够舍弃自己的性命，与朋友交往能够讲究信用，这种人虽然称自己没有学问，我也一定要说他很有学问了。很明显，在圣哲先贤的心目中，“做人”就是学问。学会了“做人”就是已经学会了“做学问”。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知识

就是美德，知识先于道德，道德产生于知识，他认为一个人没有知识，也就不懂得善的概念是什么，他就不可能为善。因此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宋朝一位名人在论及“做人”与“做学问”时说：“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子颠覆者多矣。”明末政治家王夫之认为学习知识和修养品德应当并重，即进德修业。“学者之所以学，教者之所以教，皆有其当务焉。”意思就是说学与教都不能忘却兴国安邦大计。元朝教育家吴澄认为：“学必以德性为本。”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则明确提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应该说，他们所论，虽然受时代条件的制约，但仍不失为精粹之言，至今对我们的思考仍大有裨益，值得借鉴。

学会“做人”与学会“做学问”两者不是彼此孤立、互相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辩证统一的。没有学问，不学无术，将是平庸人生，无所作为，难以受到他人与社会的尊重。同样，“德不优者无以怀远”，“非志无以求学”，“做人”是“做学问”的基础，“做学问”是对“做人”的全面检阅。只有真正的人才能做出真正的学问。一个内心充满假丑恶的人，其做学问的动力必然匮乏，也不会在学术领域中开辟出个人的天地。一个人品质上的真善美与其在学术研究上的真善美成正比关系。然而，“做人”与“做学问”相比，“做人”更为重要。因为“做学问”仅是手段，“做人”是最终目的。“做学问”最终是为“做人”服务的。可见，“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教育学生学会“做人”与“做学问”是大学主要的两项教育功能，也是学生义不容辞的天职，两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我们知道，社会的演绎与历史的进步，从某个意义上说，是知识的力量在起作用，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就不会有今日的现代文明。因此，大学要重视“做学问”的教育，青年学生也要利用良好的环境与条件，矢志不渝，

锲而不舍，刻苦攻读，勇攀科学文化的高峰。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为了教育的教育，而是将教做人作为教育目的。因此，学校决不仅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假如学校把“做学问”的教育放在凌驾一切的位置，而把对如何做人的教化功能无情地忽略乃至遗忘，那么学校给社会输送的只能是有专业技术知识而缺乏健全人格与不会“做人”的“机器人”与“空心人”。青年学生如果只是全身心投入学习而对思想道德修养不屑一顾，不闻不问，那势必会在人格完善方面留下隐患，甚至会给社会与人民带来灾难。1996年，日本发生震惊全国的“奥姆真理教事件”、“爱滋病药害事件”就是佐证。因为人们发现，在事件中扮演主角的不乏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被誉为日本高校“宝塔之尖”的东京大学医学院遭到了全社会的强烈指责，因为所有这些恶性事件都有其毕业生参与策划。痛定思痛，东京大学医学院进行自我解剖和反省，结论是学校忽视了对学生关于“做人”的教育。于是，校方从1996年开始从招生方法入手进行改革，即在笔试的基础上由3~5位教授对考生的品德修养、人际协调能力等素质进行问卷、面试和考察，进行综合判断，作为是否录取的重要依据。可见，科学技术是双刃剑，既可造福人类亦可为害人间，从这一点看，学会“做人”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于1996年11月5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谈话称：“在21世纪将要来临的时候，第一个要强调的是学校要教育学生学会如何做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博士也说，要教育学生，使学生不仅仅是“学知识”，而且要“学做事，学做人，学会与他人生活”。

学会“做学问”不等于学会“做人”。俗语说：“知书明礼”，其意就是说书读得多了，视野就会宽阔，就懂得规矩，就会善于分辨是非，明辨善恶，就可以提高道德判断和道德实践的能力。这话不假，但并非说，学好专业、“做好学问”就意味着“学会

做人”。因为历史上不乏这类人，他们学问足以傲视同侪，但由于不懂得如何与他人共处，如何做人，得不到众人的支持，空有一身本事却无用武之地，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一个不懂得为人处世的人是难以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大学生知识渊博，学问功底扎实，只是日后能在社会中建功立业的必要条件，但要想有所作为，还要在“做人”方面下足功夫。一个人如果有才无德，最终还可能沦为人民的罪人，不但危害社会，而且还会断送自己的前程。如广州某医学院的一名年青教师，本来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前程一片光明，但由于收人待遇低引起心理不平衡，试图改善自身物质生活水平的欲望日趋强烈。后来由于一念之差，参与了一个制造冰毒的团伙，利用自身的学问去祸害社会并为自己谋取不义之财。小投入换来巨额金钱，使这位青年教师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最终东窗事发，带着无穷的悔恨走上了不归路。几年前美国依阿华大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已是博士研究生毕业在即，学问不能说不好，可就是这位前程堪称远大的博士生，却面为嫉妒心理而枪杀同胞、导师，最后又断送了自己，造成轰动全美的“卢刚事件”。无独有偶，前不久北京某著名学府的学生，因生活中与同学们发生小摩擦，竟然萌生向同学投毒的念头，他从实验室偷而少量的砒，向同学的餐具里投放，给他人乃至自身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可见，学会“做人”何等重要与必要。没处理好“做人”的问题，学问大危险就越大。理在，高智能犯罪的现象在高等学府里时有发生，的确令今日的学子们深思。

“做人”与“做学问”相比，“做人”更重要。这是由教育的特质决定的。因为每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要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意志，培养他们的接班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为教育而教育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早在大学最先出现时，英国就把“有修养的人”、“高贵的人”作为培养目标，并把“做人”的教育放

在首位，因为教育的成果与目的“不是书，而是人”。如果说“做学问”是智育的话，那么“做人”就是属于德育的范畴。近年来，世界各国都注重对青年学生进行“做人”的教育，认为这与国家的前途相关。美国前总统布什曾提出要把道德教育列入教育体系。美国现在也不断地反思大学阶段的道德教育，提出要把对大学生进行品德的教育放在应有的高度，要在大专院校的学生中培养道德心、品德、公民义务和社会责任感。认为品德教育失败，就是公共教育的死亡。德国提出要100%的学生道德合格，98%的学生掌握生存技能。日本提出德育是关系日本21世纪命运的关键，并把“智德体”的教育目标改为“德智体”。我国近年来也强调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要求学校与学生都要把德育放在首位，因为“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④青年学生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⑤。因此，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课教学。

我们加强德育教育，强调“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这是因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仍然存在，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正在加紧对我国进行西化与分化，企图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加上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悄然面人，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腐朽堕落思想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加强德育教育，在“做人”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没能解决好，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会在面项基本原则等问题上糊涂、彷徨甚至走向反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毁于一旦。

只要我们翻开历史，就会看到古今中外的有成就的名人几乎都是会“做学问”又会“做人”的楷模。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们当之无愧，作为伟大的学问家，他们光耀后辈。他们以其求索

的一生向世人展现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模式，并以他们在人生中展现的智慧、精神和道德表率力量证明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一个无德无志的人，是做不出真正学问的。真正的学问必然要求为之献身的人且要具有诚实不欺、勤思明辨、自信果断、勇敢坚毅、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和社会责任感。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现在这代人往往注意我们这些人发明了什么，有什么作用，实际上我们这些人的道德行为对世界的影响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更大。”^⑥他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⑦

马克思把“做学问”比喻为“人地狱”和在崎岖道路上披荆斩棘勇攀高峰，认为只有具备敢于人地狱的勇气和不畏艰险与崎岖、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为了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孜孜以求，学而不厌，用40年的时间写下了人间巨著《资本论》，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发展规律，他在大英帝国图书馆中那刻苦求知的身影，而他脚下的地板被长年累月地踩出一个凹陷，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常常废寝忘食，博览群书，即使在最艰苦的战争年代，也从不中断。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家的繁荣与富强，他勤奋学习，刻苦攻读，广泛涉猎哲学、文学、美学、自然科学、逻辑学等各类书籍。正因为他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才成为一名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乃至诗人和书法家。马克思和毛泽东毕生的实践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大写的“人”和一名“大学问家”的完美组合。

三、璧合“做人”与“做学问”， 做现代文明的大学生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总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对全国青年和大学生提出了“四个统一”。即“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这是江泽民同志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和对青年学生的厚爱提出的殷切希望和要求，也是对青年学生如何“做人”与“做学问”有机统一的完美阐述。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以江泽民同志的“四个统一”为座右铭，璧合“做人”与“做学问”，做现代文明的大学生。

1. 学会“做人”与“做学问”，历来是党和国家对青年学生的殷切希望，也是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

早在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学校不能放松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学生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建设祖国的本领。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改革开放伊始，小平同志从新时期对教育与人才的要求，提出了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并把有理想、有道德放在首位。但是他又说：“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自觉，越刻苦。”^⑧小平同志在强调德育首位的同时进一步阐明了“做人”与“做学问”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2月1日